

试论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 和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

——兼评“统一战争”说

关 文 发

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定鼎北京，不仅是明清之际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对其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也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过去史学界虽进行过一些有益的讨论，但从目前情况看，分歧仍然很大。有些同志认为，清兵入关是一场民族征服战争，或称为民族侵略战争；有些同志则强调清兵入关，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或称之为统一战争。这两种说法，都有值得商榷之处，由于清兵入关导致满族入主中原，它必然涉及民族关系问题，故本文打算从如何正确处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般性原则谈起，进而对清兵入关所涉及的具体问题作一些探讨，并对“统一战争”说提出一些异议。

一、正确处理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一点认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时而相对稳定，相互依存、同化或融合；时而彼此征战，相互压迫，掠夺或征服。有时是以同一个政权（王朝）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有时又以不同政权（王朝）、甚至是敌对政权之间的关系出现。因此，正确处理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从来是正确阐述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的重要方面。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准则”。其一，姑名之为“外国论”，即以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历代中原王朝代表中国，而把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特别是与汉族中原王朝相对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视作“外国”，诸如匈奴、鲜卑、突厥、氐、羌、吐蕃、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等皆是。上述那种把清兵入关看作是民族侵略战争的说法，看来多少和这一“准则”有关。其二，姑名之为“兄弟论”，即所谓兄弟阋墙，家里打架，打倒老朽，代管家务，本身总是一件好事。上述那种把清兵入关看作是“统一战争”的说法，看来主要是从这种“兄弟论”出发的。然而，从我国的历史实际加以考察，这两个“准则”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

先说“外国论”，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完全无视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国内性，这就难以说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是我国各族人民通过长期斗争（包括与自然界斗争和社会斗争）共同创造的，也难以表述我国古代各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长期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其强烈的内聚力。象满族的前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在从先秦到明末长达数千年的岁月里，不管中原王朝如何更迭，也不管他们自身经历了多么大的变化，但西周时期中原地区所称说的“肃慎……吾北土也”^①的情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象唐代在这里设置过勃利州、黑水都督府；明代在这里建立过奴儿干都司、建州左右卫，这都雄辩地证明了边境少数

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内聚力。如果我们遵循“外国论”所定下的框框，把历史上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看作是“外国”，不仅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无法说清楚，就是内地中原王朝的历史也无法说清楚。就以中国历代的疆域来说，若按汉族中原王朝的辖区范围来套，其伸缩性之大简直骇人，其广如汉唐，则跨越中亚；其狭如南宋，有时仅限于海上一孤岛。而许多地区，象著名的河套地区、燕云十六州、甚至包括作为中原王朝心脏地带的太原、汴京等等，也就成了一个变幻不定的万花筒，时而属于中国，时而属于“外国”，整部中国通史，也就成了一部时断时续、不断亡国的历史。远的不说，就从西晋灭亡算起，占有半壁山河的十六国、北朝、辽、夏、金诸王朝，他们统治整个北方的时间本来就不短，再加上在全国范围建立统治的元王朝、清王朝，如果都算作“外国占领”状态的话，那么，中国在历史上就有相当长的时间“亡国”或“半亡国”，这说得通吗？还有，在这段时间里，那些在“外国”王朝统治下的广大汉族人民，到底算作“外国人”还是算作“亡国奴”？而那些在汉族王朝统治下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又该算作什么呢？很明显，这种搞法只能把一部中国历史弄成一笔谁也说不清楚的糊涂帐。

其实，我国历代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大小王朝，他们并不自外于中国。以入关前的后金为例，努尔哈赤即使在以“七大恨”兴师伐明时，也自动承认明朝皇帝是“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②。其后，皇太极致书明崇祯帝也说：“下情上达，则天下无不治，下情上壅，则天下无不乱。我两国用兵，亦为下情阻蔽，不得上达所致”^③。这里所说的“天下”，就明显地包括明朝与后金在内；这里所说的“上”与“下”，亦清楚表明明朝与后金所处的主从地位以及问题的内在性。过了两年，皇太极在另一次致书中还明确地说到：“昨见皇帝书曰：满州原系属国，此不特皇帝言之，即余亦未尝以为非也”^④。这就是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实际，即使双方处于敌对地位、交战用兵的时期，问题的内在性也并未改变。可见，那种把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排除在中国之外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下面再说“兄弟论”，它强调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国内性，不把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视作外国，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当中的一些同志，在贯彻这一正确原则的同时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往往忽视了民族关系自身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忽视了或者不承认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面是不平等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掠夺与被掠夺、压迫与被压迫、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这样一些对抗性的关系，由民族歧视和民族隔阂所引起的纷争，则更是大量的、经常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矛盾和斗争根源于阶级矛盾和斗争，但又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的道理。这些同志虽然在表面上也承认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的存在，但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又把它否定了。其中最突出的是把民族问题抽象化，然后以其它标准去取代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于是在有关清兵入关问题的讨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由清兵入关所引起的一场非正义的民族压迫战争，变成了一场正义性的“统一战争”；挑起恶战的一方，由于最后获得胜利，就被美誉为“结束分裂恶战”；而洪承畴这一类人物，也就在“投身到统一全国的历史洪流”这个既定的“标准”下，被认定为作出了历史贡献，应该充分肯定。有些同志甚至说：清兵入关，“面临着戡乱、安邦两大使命”。这里所说的“戡乱”与“安邦”，毫无疑问是属于“统一”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试问：这到底谁是“乱”呢？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张献忠领导的大西政权是“乱”吗？该“戡”吗？江南人民奋起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是“乱”吗？也是该“戡”的吗？！即使是对南明诸王朝，我认为也应持分析的态度，这些政权内部存在着某种腐朽势力，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在当时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里，这些王朝曾经作为反抗民族压迫的一种象征，特别是后来得到大顺军、大

西军余部全力支持的永历政权，他们所坚持的抗清斗争，仍然不失为一种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我们就不应含混地称之为“乱”。

总之，我认为在处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既要注意到它的国内性，又要注意到它的特殊性，要注意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关系的基本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一切民族纷争，特别是作为最高形式的民族战争，都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凡属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掠夺、民族屠杀，都是非正义的。判断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及其是非标准，似不应例外。

二、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对明战争的基本战略方针

明清之际，的确是一个激烈动荡的时代，农民军、南明、清军三种政治力量同时并存，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这些都是事实。但判断任何事物，即使是十分复杂的事物，总是有规律可寻的。马克思主义对待战争问题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⑤。为了正确判断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首先研究一下清朝在入关前的政治，研究一下努尔哈赤、皇太极对明战争的基本战略方针，这看来是非常必要的。

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师伐明，标志着后金与明朝之间战争的正式爆发。然而总观所谓“七大恨”，无论是“害我祖父”、“卫助叶赫”，还是“拘我使臣”、“杀之边境”^⑥，其主要内容都属于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以求得民族生存和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天命四年的“萨尔浒之战”，也无非是战争的升级和扩大，战争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但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后金先后袭取了开原、铁岭，攻占了沈阳、辽阳、广宁等关外重镇，地位变了，其政策也跟着有所改变。看来，努尔哈赤实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过来对关外汉人实行民族压迫和屠杀，即所谓“（尔）杀吾农夫百人，吾杀尔农夫千人”^⑦，“遇唐人，辄尽屠”^⑧，“辽东之破也，恐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又二年，恐民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⑨。并把“征战所俘”、动辄以数十万计的汉人，分给八旗贵族和将士为奴。很明显，这时期实行民族压迫的一方，其位置虽说是倒置了，但就其性质来说，仍然是属于民族战争的范畴。因此，我们不能仅凭努尔哈赤曾经讲过“南京、北京、汴京本非一人所居之地，乃女真、汉人轮流居住之地”这么几句话，就断定这时期“民族战争的色调业已黯然失色”，努尔哈赤已把“推翻明王朝，建立全国政权作为自己的战略方针”。事实上，所谓“七大恨”，一直到皇太极时依然是清朝对明不断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其见诸于致明文书更不知凡几。正如袁崇焕致书皇太极所说的：“然十年战斗，驱夷夏之人，肝脑涂地，三韩膏血，弥漫草野，天愁地惨，极悲极痛之事，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南关北关安在？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仇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之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汗之怨已雪，而志得意满之日也，惟我天朝难消受耳”^⑩。这些话虽带有点“外交”辞令，但后金方面以“七大恨”为理由，反过来压迫汉人的事实却是清楚的。在这期间，尽管后金对明不断发动军事进攻，但我们还看不出努尔哈赤有入关统治全国的战略意图，这不仅与其本身力量不足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努尔哈赤本人所持的战略思想有关。《清鉴纲目》有一段话：“太祖之下辽沈也，诸贝勒欲遂取中原。太祖不可。曰：昔金源蒙古不居其国，而入主中夏，致易世之后，子孙皆习成汉俗，寝以衰弱。吾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自居山海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不亦可乎”^⑪。这种“自居关东”、害怕“习成汉俗”的思想，看来正是努尔哈赤的既定方针，即使在入关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它在诸贝勒的言行和清朝政策的制定上，仍然有强烈的反映。

在皇太极统治时期,客观条件和历史环境虽然有了较大的变化,如在力量对比上清的势力进一步增长;皇太极大力招降和笼络汉族官僚、将领;政权机构有所变革;对社会生产也有所重视等等。但能否说“满汉关系不再紧张”、“民族战争不再是旗帜”、“此时社会突出的矛盾并非民族矛盾,而是新兴的清(后金)地方政权和腐败的明中央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实质是争夺全国统治的问题”呢?我看不能。不错,皇太极是说过一些“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之类的话,但究其实,皇太极仍然恪守着太祖关于“自居关东”的祖训,他历次致书袁崇焕和崇祯帝,都离不开“七大恨”这个主题,至于致书的实际内容就更加清楚。天聪元年,他自认为比明帝低一格,比明臣高一格^⑫;天聪三年,他提出了“欲去帝称汗”,请求明朝“制印给用”^⑬;天聪八年,又承认“满洲原系属国”,“只因辽东各臣,欺陵不堪,……仇怨已深,难可剖白,惟动干戈,或冀来询”^⑭。即使是到了皇太极死前一年,其致书内容也仅限于:“每岁贵国餽黄金万两,白金百万两;我国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贵国界,以塔山为我国界,连山适中之地,两国于此互市”,“自兹以后,宿冤尽释,尊卑之别,何必较哉”^⑮。皇太极的这些话,显然不是一种掩耳盗铃的策略,而是当时还不存在一个以“夺取全国统治”为目标战略。为什么皇太极六次伐明,而每次辄战即和,在和战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为什么清兵三次下长城,深入关内,逼近北京,远达兖州,而每次都只是屠戮劫掠一通,满载东还?有人可能以“山海未下”作解释,但揆诸史实,当时宁完我等人曾明确地向皇太极提出过告诫:“与其以长驱疲惫之兵入宣大,孰若留精锐有余之力取山海。臣等明知失上旨,但既见及此,不容箝口也”^⑯。可见,夺取山海的问题,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并非不清楚,也并非完全没有这个可能,这是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的问题。宁完我在提出建议时之所以表现得如此诚惶诚恐,之所以提到“失上旨”,正说明深入关内进行屠掠,是皇太极的既定方针。他的想法和努尔哈赤是一脉相承的,即“虑明国城池多,人民众,语言风俗不与我同,顺逆倏变,降叛靡常,恐难贴服”^⑰。所以在皇太极死后,范文程便迫不及待地上书多尔袞说:“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⑱。这些话,特别是“国家止欲帝关东”一语,都是有所指的。就连多尔袞也老实承认:“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为俘掠而行”^⑲。所以孟森先生对此曾有评论说:“当天命、天聪间,未尝不厚结关外之人及关内来归之人,然未能推此意于关内。观其累次犯塞,辄挟告天七大恨榜文,……固知天聪以前,清固以悍夷自处,绝未有得天下之意识也。崇德改元以后,亦未见若何改观”^⑳。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客观的、有道理的。

至于说满汉关系是否紧张,民族矛盾是否突出?我看,还是让事实来回答。就清朝内部而言,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也不能说毫无问题。象洪承畴投降后,皇太极虽然说:“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然终太宗世,未尝命以官”^㉑,其中就很有奥妙。石廷柱在一次廷议中,只说了几句对其下牛录不满的话,立即被下刑部审议,几乎丧命^㉒。可见,即使在清朝上层,民族关系还是相当敏感的。就其外部而言,终太宗之世,六次伐明,三入关内,战火、屠戮、劫夺,从未间断,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实。下面,我们不妨看看崇德八年六月奉命大将军阿巴泰凯旋时所带回的一张清单:“获黄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四两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缎五万二千二百三十四、衣万有三千八百四十领、狐虎豹皮五百有奇、角面千一百六十副,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马驼骡驴牛羊三十二万一千有奇”^㉓。试想,这份清单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而在皇太极时期,象这样“辉煌”的清单又到底有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满汉关系能不紧张吗?民族矛盾能不突出吗?看来,这种实行民族压迫和掠夺的方针,不仅在入关前存在,而且对入关和入关后仍产生巨大的影响。

三、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及其演变

顺治元年清兵入关，最后导致清王朝在全国范围统治的确立，这是一个既成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然而整个事件的历史进程，并不象有些同志现在所设想的那样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大量事实表明，与其说是清王朝固有的统一战略方针在入关后得到实现，不如说是入关后瞬息万变的外部形势，不断影响并改变着清王朝自身的战略方针。象李自成迅速打进北京，一举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吴三桂主动请清兵进关；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猝然遇害牺牲等等。这些都是清决策者始料不及的，也是我们在分析清兵入关时应该注意的。

大家都承认，范文程向多尔袞所提出的建议，对促成清兵入关、进取中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下面我们不妨对这份建议作些分析，看看清兵入关的战略意图何在。范文程提到：“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是当严申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风声翕然，如是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于入边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惟摄政诸王察之”^②。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它并没有提供一个“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与此相反，却存在不少捉摸不定的因素。第二，所谓“择坚城屯兵为门户”，虽然比过去历次进兵屠掠而返前进了一步，但也不过是建立一个前哨据点罢了。第三，建议中上下两处都点明“大河以北”，看来绝非偶然，这可以说是当时那批附清汉臣日思夜想的事。其实早在皇太极时，降臣王文奎等就曾经提出过：“乘中原扰乱之秋，率兵直入，黄河以北，非明所有”^③，只不过皇太极对此未予采纳，而这次多尔袞却付诸实施。不管怎么说，这般“进取中原”，就其本意来说，充其量也不过是谋取北京，据有河北，重现类似南北朝或宋金相峙那样一种局面，这应算作统一还是算作分裂，是不言自明的。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似不应以“成王败寇”的观点去衡量。

其实，清兵入关时并没有明确的“统一全国”的战略，还有下列事实可证。第一，入关前夕，多尔袞就曾答应过吴三桂提出的“裂地以酬”、“黄河为界，南北通好”^④的要求，所以后来“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在反清檄文中指责九王“顿背盟约”，看来并非凭空捏造。第二，在清兵进京后，英亲王阿济格曾经大吵大嚷，反对迁都北京，主张“乘此兵威，大肆屠戮”后，“或退守沈阳，或还保山海”^⑤。尽管多尔袞没有同意，但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绝非阿济格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努尔哈赤以来的传统方针，在当时的八旗贝勒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第三，多尔袞入京后，面临这突变的局势，有一段时间也确实显得心中无数，如当时有人认为，颁布薙发令“非一统之策”，“九王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⑥。这是对内部讲的，当是真心话。第四，顺治元年六月初一，多尔袞驰诏江南诸明臣，其中提到：“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非有富天下之心”，“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⑦。当然，对这番话作安抚南明、避免两线作战的解释也未尝不可。但从当时的形势来说，特别是从清朝若果真已确立统一全国的战略来说，讲得如此庄重、实在和主动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其实这种划河而守、南北分治的想法，在当时不仅清朝有之，南明方面亦有之。甲申八月，弘光朝派以左懋第为首的北遣使团时就曾议论过，“或言以两淮为界，高辅弘图曰：山东百二山河决不可弃，必不得已，当界河间耳”^⑧。所有这些，集中说明一点，就是清兵入关之初，

并没有统一全国的战略意图。

那么应该如何判断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呢,根据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交战双方基本阵营的变化来看,我认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清兵入关到李自成牺牲这一年时间,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战争的性质是满汉地主联合镇压农民军的阶级斗争;从弘光政权的覆灭到李来亨在夔东抗清的失败这近二十年时间,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战争的性质是民族压迫与反抗民族压迫的民族战争。

清兵入关初期战争的性质,不仅要从清朝方面看,也要从明朝方面看。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从而把明末以来本已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而清兵之所以能顺利入关,则是吴三桂出于仇视农民革命的立场请进来的,从本质上说,它是明末阶级斗争的延续。交战双方的阶级阵营也异常鲜明,即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为一方,满汉地主(包括南明势力、满洲贵族、降附清朝的汉族地主官僚、大顺政权辖区内的地主势力)为一方。战争总的目的,就是要迅速扑灭农民革命,恢复和稳定地主阶级(不管它是汉族的还是满族的)封建统治。这种阶级复仇思想,以吴三桂所发布的“告示”和向清“乞师书”为开端,在满汉地主的各种势力中都有极其强烈的反映。象吴三桂就叫嚷:“切痛先皇被弑,亘古奇殃,剧寇披猖,往代未有”^②,特向清兵“泣血求助,……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③。多尔袞则答以“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斧,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④。其后致书史可法又说:“夫闯贼但为明朝崇耳,未尝得罪于我国家也,徒以薄海同讐,特申大义”^⑤,并多次向南明提出:“同以讨贼为心”^⑥,在军事行动上则全力西剿。范文程在李自成攻破明都时,虽养病盖州,但闻讯后便立即驰驿献策:“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又署名发表文告:“义师为尔复君父仇……今所诛者惟闯贼”^⑦。在大顺政权辖区内的地主官僚也纷纷蠢动,他们趁大顺军遭受挫折之机,或发动叛乱,或开门迎纳清军,造成李自成后方不稳,难以实现退保关中的计划。弘光朝内,对农民军更是咬牙切齿,其中以史可法表现最为突出,他说:“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梟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为了达到阶级复仇的目地,他极力主张“联虏灭寇”。对于清兵,他虽然知道“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但他所持的理论却是“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名义,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⑧。即使后来多尔袞因南明“拥号称尊”,公开提出:“予将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⑨的威胁后,他对“联虏灭寇”仍然毫不反悔,并向多尔袞恳求说:“今逆成未服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讐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梟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⑩。甚至在他已确知“一旦寇为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后,仍然疏请:“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与四镇,悉简精锐,直指秦关”^⑪。从史可法个人来说,这固然是顽固到极点,但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持这种立场又是必然的。象左都御史刘宗周曾上“讨贼四策”,呼吁“陛下再发哀痛之诏,立兴问罪之师”^⑫。作为四镇之一的高杰,也遗书多尔袞说:“兹逆成跳梁西晋,未及授首,凡系臣子及一时豪杰忠义之士,无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寝其皮,昼夜卧薪尝胆,惟以杀逆闯、报国仇为亟。……若杰本念,千言万语总欲合师剿闯,以成贵国恤邻之名”^⑬。在这期间,南明方面之所以未有出兵夹击,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其原因主要在于弘光朝君昏臣闇,醉生梦死,四镇又拥兵不听节制,相互攻杀,所以“联兵西讨”虽未成为事实,但弘光政权敌视农民革命的阶级实质却是够清楚的。

正由于满汉地主阶级都把农民军视作死敌，并把消灭农民军的任务放在首位，再加上大顺政权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新形势下充分暴露出来，在力量对比上迅速逆转，因而这一阶段的战争，仅仅持续了一年，便以李自成的牺牲而基本结束。

入关战争的第二阶段，则是从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政权覆灭后开始的。本来多尔衮在攻克太原后曾计划分兵两路，并密谕“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往征流寇；命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往征江南”^④，但又因“全力西剿”而迟迟未能实现，直到顺治二年二月拿下西安后，才再谕豫亲王“趋往江南，流寇余氛，责令英亲王等追剿”^⑤。应该说，清军这次南下，进展是十分顺利的，下面是多铎在奏报中所提供的一张时间表：“大军于四月初五日自归德府启行，沿途郡邑俱投顺，……十八日，大军薄扬州城下，……二十五日攻克扬州，获史可法，斩于军前，五月初九日渡江，初十日福王率马士英等潜逃，十五日克南京，六月俘获福王于芜湖”^⑥。前后仅四十天便拿下南京，消灭了弘光政权，难怪当时清廷上下都认为“金陵归顺，福王就擒，一统之业已成”^⑦。如果它真的是一场单纯的统一战争，按这样的势头，南方各省当不难传檄而定，天下即可太平，其后的那场持续达二十年的恶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起码它所遇到的抵抗不至于那么激烈，持续的时间不会那样长，社会经济所遭受的破坏也不会那样严重。然而清兵入关与南下毕竟是不同于一般统一战争的民族战争，它所固有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掠夺、民族屠杀政策要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在进关初期，为了争取汉族地主官僚的支持，全力镇压农民军，因而在实行民族压迫方面不能不有所抑制，就连进京后第二天宣布的薙发令，也很快予以中止，多尔衮谕兵部说：“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⑧。然而到了顺治二年六月，情况完全不同了，李自成失败了，弘光政权被消灭了，清统治者以为大局已定，大业已成，便公然以征服者的身份君临天下，无所顾忌，一意孤行，其中尤以强制推行薙发令最为突出。先在六月初五驰谕江南，接着又在十五日通令全国：“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省，亦限旬日，尽行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⑨。后来更干脆称之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⑩。这样，民族矛盾便大大激化起来，迅速上升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一场体现民族压迫与反抗民族压迫的恶战，便以清统治者强制推行薙发令为导火线，首先在江南地区爆发了。

当时在南京周围的江阴、嘉定、常熟等许多地方，本已归顺新朝，各级地方官已走马上任，当地老百姓也认为“想无事矣”^⑪。然而薙发令一下就立即炸开了，有的慷慨激昂地提出：“头可断，发不可薙”^⑫；有的则满腔悲愤地表示：“宁作束发鬼，不作薙头人”^⑬！一时，包括农民、市民、手工业者、士大夫、中小官吏和乡绅在内的汉族各阶层，都围绕着反抗民族压迫这个共同目标而奋起战斗。仅江阴一座孤城，血战达八十一天，毙清三王十八将及士兵七万五千有奇，而江阴人民却为此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城破之日，清军下令屠城，“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被屠杀者达十七万二千有奇，城中未死者大小仅五十三人^⑭。象这样的战争，又怎能说是统一战争呢？对于薙发令，即使在清统治层内部亦有强烈的反映，如大学士陈名夏就曾私下对同僚宁完我说过：“要天下太平，只须留头发，复衣冠”^⑮，后来被宁完我告发，竟被处绞刑。

当时促使民族矛盾上升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因素，除薙发令外，还有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等法令，这些都是清兵入关后、特别是拿下南京后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主要内容。所谓“易服”，其实是与薙发属同一类型，都是在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上对广大汉族人民加以压抑和摧残，人为地在各民族中树立满族的“首崇”地位。所谓“圈地”，实际上是在“满汉分

居，各理疆界”的名义下，大肆圈占汉人田产，“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⑤。所谓“投充”，则以“为贫民衣食开生路”作借口，迫使大批汉人投献产业，成了旗下的奴仆。所谓“督捕逃人”，实际上是给了大大小小的旗主得以对汉人进行任意的敲诈勒索的权力。所有这些，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压迫的特征，并且成为顺治二年六月后战争不断持续和扩大的根源。这些政策，虽然在清廷内部亦颇有异议，但多尔衮一意孤行，竟下令“有为 薙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⑥。这样，恶战便难以避免了。

正由于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因而继福王政权之后建立的鲁王政权、唐王政权、桂王政权，它们的基本政策上都有明显的改变，即把反抗民族压迫作为政策的基点，对于农民军则一改弘光朝所坚持的“为君父复仇”的敌对立场，转为积极争取与联合。这样，它们才有可能成为民族自卫战争的某种象征，并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人民的支持。如果我们仅从维持或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这一点去看，这些南明小王朝的存在的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正因为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才有可能采取“联明抗清”的政策，并以自己的主力部队，先后在两湖战场、两广战场、云贵战场英勇地抗击清兵，几度使战局逆转，几番出现了高潮。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什么“匡扶明室”、“归顺效忠”，那么农民军的“联明抗清”也同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是应该予以辨明的。这些斗争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它伟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使满洲贵族终于看到了汉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无比威力，从而对各项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使入关以来紧张的民族关系和尖锐的民族矛盾得以缓和下来。康熙帝之所以得到赞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吸取了教训，与他的先世比较起来显得高明多了。当然，这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的民族关系和清兵入关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两者又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正确处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才能正确理解清兵入关所引起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清兵入关，最后确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并不等于清兵入关战争的性质是一场统一战争。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确立后，对促进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并不等于清兵入关战争本身起了积极作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由于以“统一”作为既定标准，去衡量明清之际的一切事物，因而对一些降清人物的历史评价被拔高了；清兵入关对社会经济所带来的破坏作用被忽视了，或者是被掩盖了；对于明清之际所面临的殖民主义侵略威胁也有言过其实之处。对于这些问题，因本题所限就不多说了。总之，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同时，对清兵入关的实质亦应作出恰如其份的揭示。

注释：

① 《左传》卷二十二。

②⑥⑩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蒋良骥：《东华录》卷一第7页、卷一第7页、卷二第19页、卷二第21页、卷四第55页；卷四第58页、卷四第62页、卷四第66页、卷四第66页、卷五第72页、卷五第75页、卷五第77—78页、卷七第115页。

③⑬⑭ 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六年十月、天聪三年闰十一月、顺治元年四月。

④⑭ 《开国方略》卷十九。

⑤ 《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23—24页。

⑦ 《清太祖实录》卷五天命三年三月。

⑧ 李民寅《柵中目录》。

⑨⑪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卷二十。

(下转10页)

是由季刚先生建议而撰成的。季刚先生承用师说，却有所发展。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一) 不局限于字源的推寻，力求探索语源，为语源学奠定了基础。耀先教授《笔记》中提到了这一点。他说：“近时章太炎《文始》，只能以言文字，不可说语言。如羊，祥也。火，燬也。以文字论，先有羊、火；以语言论，而祥、燬实在羊、火之先。故《文始》所言，只为字形之根源，而非字音、字义之根源也。”(199页)

(二) 创立一字多根之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这里不必细说。总之，季刚先生这个说法是值得研究的。

(三) 语根之学，不重在远求皇古之前，乃为当前争取字书之用。这体现了古为今用的精神，是很可宝贵的。

季刚先生不仅如前面所说，在语言文字学方面堪称一代宗师，而且在经学、哲学、史学、文学诸方面也都冠绝当时，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人鲜能及。象我这样学识浅陋的人，怎能窥其壑奥？因此，我把自己阐述的对象限制在黄先生所论形音义关系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不贤识小，大方之家，幸勿见笑。

(上接87页)

⑪ 印鸾章：《清鉴纲目》卷首第16—17页。

⑫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宁完我传》。

⑬⑭⑮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崇德五年正月、卷四十三崇德三年八月、卷十二天聪六年八月。

⑯⑰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二《范文程传》。

⑱ 《沈馆录》卷七。

⑲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第392页。

⑳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七《洪承畴传》。

㉑②③ 《谈闻续笔》卷一。

㉔ 《李朝实录》卷四十五仁宗二十二年八月戊寅。

㉕ 谈迁《国榷》卷一百零二崇祯十七年六月辛未。

㉖ 李清：《三垣笔记》卷下。

㉗⑲⑳ 《明通鉴》卷九十第3485页、附编卷一上第3523页、附编卷首上第3544页。

㉙ 《史忠正文集》卷一《奏疏》。

㉚⑳㉑㉒㉓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七第158—159页；卷三第59页、卷七第155页、卷九第199页、卷九第199页、卷九第197页。

㉔⑳㉕㉖ 《清世祖实录》卷五顺治元年五月辛亥、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卷十二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卷二十八顺治三年十月乙酉。

㉗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

㉘ 许重熙：《江阴城守记》。